

餐桌上的历史风景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张文静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吃”一直是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进餐的?古人餐桌上的礼仪又是怎样的?

分餐与小食案

现代中国人一般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进餐,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不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我国历史上还有过另外的进餐方式。

“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王仁湘说道。

令人意想不到的,这种转变的契机竟然与中国人起居方式的改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周秦汉晋时代,筵席上之所以实行分餐制,应用小食案进餐是个重要原因。“如果食案没有改变,饮食方式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事实上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确实是由高椅大桌的出现而完成的,这是中国古代由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王仁湘接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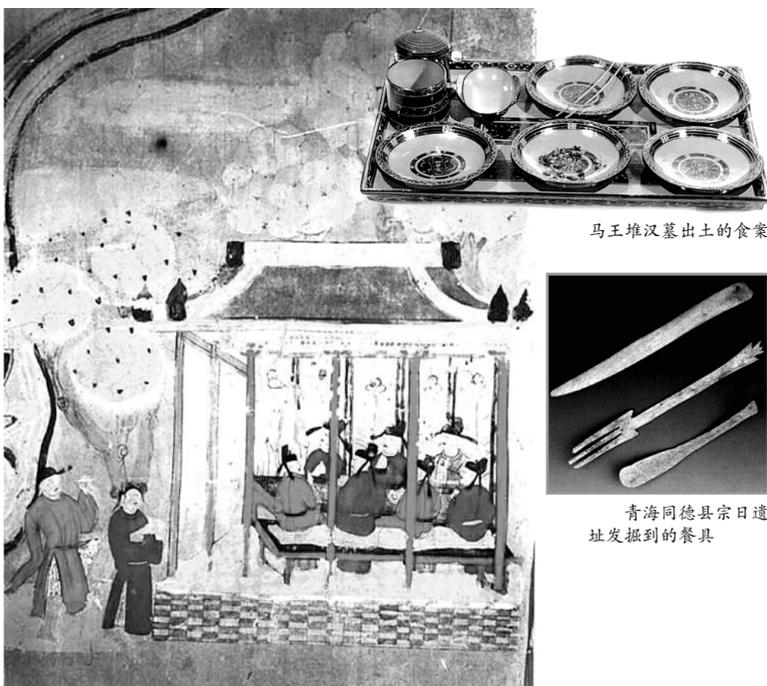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餐,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来说的“筵席”,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这种以小食案进餐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王仁湘认为,在考古实物证据方面,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而且也指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王仁湘解释道。

会食与高椅大桌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

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根据王仁湘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坐姿势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食案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到的餐具

敦煌壁画宴饮图

王仁湘供图

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

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家具的改变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化,也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不过,中国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

王仁湘介绍道,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例如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夜宴部分绘韩熙载及

其他几个贵族子弟,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个盘盏盖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餐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并非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怀古心绪的一种流露。

“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仍有一定的影响力。”王仁湘如是说。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和饭馆里。”王仁湘认为,无论是分餐制、会食制,还是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都是历史的产物。

多样化的食具

现代社会流行最广的进餐方式是这样三种:用手指,用叉子,用筷子。中国人是用筷子群体的主体,是筷子传统的传人。

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进餐的呢,古代是否还采用过其他什么进餐器具呢?

“现代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发掘出土的大量古代进餐具实物,将我们所寻求的答案明晰地展示到了世人面前。”王仁湘介绍道,以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古代中国人使用的进餐用具,主要有勺和筷子两类,还曾一度用过刀叉。

“这些进餐器具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筷子,它的使用至少已有3000年上下连续不断的历史。”王仁湘接着说,“古代中国人使用餐勺的历史也十分悠久,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勺与筷子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进餐器具,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老的富有特色的熟食传统,决定了我们独特的进餐方式。华夏先民的主食是粥饭,副食为羹汤,这些都不便直接用手抓食,还要借助手指之外的食具,才能将食物顺利送入口腔。我们现代人享用中餐,要使用筷子和餐匙,这个传统其实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

虽然现代中国人进餐中餐很少用叉子,不过考古学证实中国的餐叉出现在4000多年前,而随着西餐传入的餐叉却只有1000年左右的

历史。“中国人在很早就发明了餐叉,这个发明完成于史前时代。在历史时代,我们的先人仍然保留着使用餐叉进餐的古老传统,只是由于这个传统时有中断,餐叉的使用在地域上不很普及。”王仁湘解释道,“在古代,作为进餐具的餐叉并不是单独使用的,与它配套使用的除了餐刀,还有餐勺。例如郑州二里冈同餐叉一起出土的,还有餐勺;侯马故城的餐叉,也与餐勺共存。”

古代餐叉的使用与肉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古代将“肉食者”作为贵族阶层的代称,餐叉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专用品,应当不会普及到一般民众中。下层社会的“藿食者”,因为食物中很难见到肉,所以用不着制备专门食肉的餐叉。

“中国人用餐叉的历史已经追溯到了5000年以前,不过我们没有将餐叉作为首选的进餐器具,它实际上是被淘汰出了餐桌,这显然是我们更有适用的筷子的缘故。”王仁湘最后说道。

看图说史

试管婴儿诞生记



爱德华茨和两名试管婴儿



全球首名“试管母亲”和她的“试管婴儿”



露易丝·布朗诞生



报纸报道

1978年7月25日,深夜23点47分,一位重约2.6公斤的女婴通过剖腹产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德姆总医院降生。这位有着蓝色大眼睛,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当时备受世界关注。她就是世界第一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降生的露易丝·布朗。露易丝·布朗诞生,成为当时全世界媒体的头条新闻,被称为“世纪之婴”以及“奇迹婴儿”。

露易丝之母因患有输卵管堵塞症无法生育,英国著名妇产科医生罗伯特·爱德华茨和帕特里克·斯蒂特于1977年11月16日从其体内取出一个卵子,在试管内受精后植入莱斯莉的子宫。于是露易丝开始在母体内发育了。

在露易丝坠地之前,人们担心试管婴儿的诞生会破坏已有伦理关系,威胁到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有人甚至担心“试管”中孕育出的是畸形怪物。当年的报纸纷纷惊呼——人类“在扮演上帝”,又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违反了伦理道德”之类的谴责。出生10个月后,露易丝开始学习走路,3岁

时就可以乱跑,聪明活泼的她改变了大多数英国人对“试管婴儿”的观望和反对态度。到今天为止,“平民化”了的试管婴儿像一个个欢乐天使,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当初由“奇迹婴儿”所引发的争议也烟消云散。

利用体外受精技术生产出来的婴儿称为试管婴儿(Test tube baby),并非胎儿发育过程全在试管内。由母体得到成熟的卵细胞后,保存在卵巢内,再将父体的精子与之混合,进行体外受精,培育受精卵1~2天后,分裂成大约8个细胞的胚胎时,再将胚胎植入母体子宫内,继续发育直至分娩。整个过程真正在试管内的时间只有2~6天而已。以目前的技术,尚无法在体外将胚胎培养至足月。

“试管婴儿”技术,为许多患有输卵管疾病而不能生育的妇女带来了希望,也是人类胚胎学的重大突破。在露易丝·布朗之后,全世界共有140万儿童在试管的帮助下诞生,中国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在北京诞生。(沙森整理)

记忆

早在刚进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便教导我们,数理化是规则分明的学问,“差一个小数点也不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理工科科学家的印象多少有些呆板。

然而,如果走近我国物理学的顶尖人物,会发现其中大有一些像电子一样满怀活泼的人物。

黄昆院士说话诙谐,魏荣爵院士嗜好京剧,这是科学院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201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又领教了一位九十岁老院士的文学修养。一位在该社工作的编辑告诉笔者,当时社里要出冯端院士所著的物理学名著《Condensed Matter Physics(即《凝聚态物理学》)中文版。工作过程中,有位久经考验的理工科编辑带着满脑门子“官司”来找主编,说物理学的内容整理起来问题不大,能不能再给配个文学编辑啊,毕竟莎士比亚什么的自己实在不熟。

凝聚态物理学的著作,怎么出来莎士比亚了?一头雾水的主编看过书稿才明白,原来冯端的这部作品,英文版每一章都带一段导语,用的不是欧洲古典诗篇便是格言,比如“对不可言说的进行探究,使你迷惘的生命趋于成熟”,这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再比如“像滔滔波浪滚向沙滩,我们之光阴不息地奔赴终点”,这是莎士比亚的。要校对这部分内容,没一点文学修养还真是不灵。

冯端能写出这样异类的物理学书来,跟他的经历大有关系。

冯端,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一个中国书香世家。其父冯祖培为清末名士,能力出众,曾任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总办,蒋介石便是出自这所学校。尽管全力为国家做事,但旧中国的残破凋敝,科学技术的落后,让冯祖培深感唏嘘。于是,他把四个孩子全部按照科技人才来培养。他的大儿子冯煊,二儿子冯康,女儿冯慧先后赴欧美留学,除冯煊因受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聘用而滞留海外,其他二人均回国,与在国内侍奉母亲的冯端同为中国科学院服务。这其中,冯康和冯端后来均被授予院士称号,冯慧本人虽然不是院士,但却以贤内助的身份辅佐丈夫在行业登顶——冯慧的丈夫便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

1946年7月,冯端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系主任和导师是我国核事业的先驱赵忠尧先生。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后,冯端历任物理系副教授、教授及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端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数十年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物理学事业。尽管未能留学海外,但冯端由于刻苦努力,其学术成就在国际上极受瞩目。他发展了利用蚀刻法观测位错的技术,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发现了蚀刻法位错线成像规律,澄清了体心立方结构的金属中的位错结构。他曾长时间专注于激光与非线性光学晶体的研究。在X射线衍射照相、电子显微观测技术和成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晶体生长中避免和控制位错等缺陷的方案,大幅提高了晶体质量和器件性能。

这是一位真正的物理学泰斗,在专业上的游刃有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诗歌嵌入专业著作中而毫无滞涩。

这实在不应有什么惊奇,谁也没有规定物理学家不能同时当诗人。事实是冯端先生不仅喜欢诗,而且自己写诗,并且一写就写了六十年。有意思的是,他的读者只有一位,这神秘的读者,是谁呢?

2015年4月1日,对南京先锋书店的钱小华老板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位热爱文化的店主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才子佳人能够在他的店里济济一堂。这一天,他的店里的确高朋满座,大家来到这里,是来参加冯端先生和他妻子陈廉方女士“钻石婚”庆典的,他们相濡以沫已经六十年了。

也就在这个仪式上,冯端先生披露了这个秘密,原来,他的那位神秘读者,便是其爱人陈廉方女士。他们结婚六十年,这位物理学家给太太写了六十年的情诗。

陈廉方女士也大方地承认了这一点,还友好地拿出了夫妻双方合译的诗集赠送给她。在她的记忆中,两人是参加联谊时认识的,当时男士们都穿着中山装、列宁装,只有冯端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袍。两人熟悉后,冯端赠与陈廉方两本诗集《青铜骑士》和《夜歌和白天的歌》,成为两人定情之物。

平心而论,冯先生的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愧世家出身。我们可以共赏其中一首情诗,冯先生是这样写的:“遥望南天白下门,悠悠往事了无痕。楼前红叶窥翠禽,玄武白雪凝山盟。春情婉婉存心底,秋色旖旎勾梦痕。弹指一挥惊世殊,犹怜媿媿伴终身。”日前,为了纪念冯端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冯端星”。这颗星星,想来也是诗情画意的。

冯端与物理学专著里的莎士比亚

■萨森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余部、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揭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曾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拼,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

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董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

【吕小羽根据《百度百科》及相关历史资料编写】